

政治变动与地方秩序

——以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为例

齐超儒, 徐茂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清末“新政”是清代政治体制的最大变革,由此而对地方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地方酿成抵制“新政”的风潮与民变,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的爆发即是其中一例。从根本上看,“新政”是清政府经历了“庚子之变”后所展开的全面自救,其压力来自于外部,而非基于国内社会广泛一致的需求。新政的举办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直接的利益,反而使民众成为抽税纳捐的主要对象,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同时,新政的推行也使得传统的绅民关系发生变化,士绅凭借“新政”更多地控制乡村公共经济资源,在经济和政治上确立更大的优势,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户口调查过程中所发生的反对风潮,一方面影响了调查的进度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风潮对于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加剧了清政府统治危机。

[关键词] 清末;嘉定;户口调查;《嚆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6-0095-08

作为清末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其目的不同于以往,调查所得的数据不仅是朝廷征税、征兵、征发徭役的根据,而且对于划定选区、调查选民、选举议员,实行各项新政起着重要作用。不过,在各地的调查过程中,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户口调查风潮,甚至酿成民变。对此,学界已经有了部分研究^①。但针对反户口调查的研究,学者利用的资料多为《申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全国性报刊以及官方文件,这些材料侧重于国家行为及其代表人物,因报道立场、范围及篇幅所限,难以对反户口调查风潮在地方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考察。本文以嘉定地方性报刊《嚆报》^②为中心,通过对有关陆渡桥乡反户口风潮记载的考察,试图还原此次风潮在嘉定地区发生的始末,并借此探究清末新政推行下官绅民关系的变化。

一、地方自治与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之爆发

(一) 户口调查——地方自治之准备

户口问题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户口多寡

被认为是国力强盛与社会治乱兴衰的重要标准,也是历朝历代用于征税、征兵、征发徭役的重要根据。清末的户口调查与管理是由巡警部负责,对于户口的重要性,该部在有关清查户籍的奏折中曾提及:“诚以户籍能清,则地方盛衰,人民消长,赋税多寡,奸宄有无皆不难周知”,“查户口为警政之关键,果能切实推行,不但宵小无从托迹,良善易于保卫,即教育风俗,赋税征调诸大端,亦皆以此为基础。”^[1]178-179

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前提,户口调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06年9月清廷颁布上谕,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负责民政事务。1907年4月民政部颁布《清查户口问题》:“何以强迫禁烟?何以厉行征兵?何以定制租税?何以配赋商工业?何以振兴?概括言之,国民之权利义务,何以规定,莫不以清查户口为始基”“清查户口,所以为今日必办之要政者,不仅为教育或禁烟计也,其最大之关系,在使他日编订宪法、组织议会、颁布自治制度之际,预核全国人民,厘定选举区划分,自治制具权利能力者几何,人应负担义

[收稿日期] 2019-09-20

[作者简介] 齐超儒(1994—),男,山东济南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江南社会史。

徐茂明(1956—),男,江苏泰州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江南社会文化史。

务者几何,人服役兵事者因是而定其额,征收国税地方税因是而剂其平,一切新政,观其结果以为断然。”^{[2]149-152}同年,《民政部奏请查户口以举民政折》再次强调户口调查之必要:“练兵兴学,理财清匪,各要政无事不以清查户口为先。”^{[3]336-337}

1908年民政部开始筹备户口调查的相关事宜,制定了“六年调查户口计划”,即第一年颁布户口调查章程,第二年调查各省户数,第三年汇报各省户数,制定《户籍法》,第四年调查各省人口数,第五年汇报各省人数,颁布《户籍法》,第六年实《户籍法》。^{[4]18}同年12月民政部颁布了《调查户口章程》,共十一章四十条,对调查职员、区域、户数、口数、年限、经费、要则、罚则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依据这一章程,各地户口调查工作相继展开。

(二)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之爆发

在清政府推行户口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却不断出现反对户口调查的风潮。据《清末民变年表》统计,仅1909年至1911年10月的两年多时间里,直接因反对户口调查的民变遍及全国10个省区,共计69起。^[5]此事首先于1909年4月份在江西丰城出现,“调查人户总数,为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之一端,各省皆应依限办理。初未闻因此滋事,独江西乃风潮迭起,此倡彼和。或曰将以抽丁当兵也,或曰将以按人勒税也,甚或讹言朋兴,非理可喻。乃至有殴官杀人,纠众毁屋之事。”^{[6]222-225}不过,随后江苏、广东、直隶、浙江、安徽、云南等省份也出现大规模的斗争。^[7]

嘉定地区的反户口调查风潮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东方杂志》中《江苏乡民滋事余闻》记载:“嘉定城北陆渡桥,捣毁桥厂董事及经董住宅七家。”^{[8]25}民国《嘉定县志》也对此事进行了记载:宣统元年,“该乡宙十图、陶六图乡民误信谣言,反抗调查户口,殴伤所长、经董,捣坏屋宇,撕毁名册。县派飞营缉获首要二人惩办,风潮始已。”^{[9]2896}

与县志相比,嘉定的《嚆报》对于此次反调查户口风潮的报道更为详细。据该报记载,1910年5月21日,有一个卖小鸡的小贩,在陆渡桥乡“述及种种谣言,有谓现在所造之户口册,将来卖于洋人筑铁路桥之用,价值极贵,每户值洋二十元。俟此册临

用时,册中所书之人皆立毙等语”。^[10]这使得该乡民众大为疑惑,遂产生了抗查户口之心,并有捣毁乡董房屋,殴打调查员等行为。“有宙十图、陶六图某某等结党数十人,驰至各经董家,寻衅殴人毁物,无所不为。被殴者为所长侯史封,身伤沉重,庵桥人陆飞千,发辫被拔,亦有微伤。经董杨福昌、金晋文、顾振言、梁庆堂、梁心田、费为南、秦廷爵七家,门窗、凳枱、水车、屋面以及杂物尽被打毁,并欲将侯董置于死地,后迫令书票一纸,保该党徒三年无事,又将户口册要还,尽皆扯去。”^[10]次日早上,该乡参议员将此事上报县令,并将伤者送往苏州医治。知县邵鼎特意派荆游戎、程少尉至该乡靖龙庵进行“劝谕”,检查各乡董被毁物品,并对乡民进行劝导。不料引来围观者达三百余人,期间“有老妇多人,将游戎等围住吵闹不休,游戎衣服略被扯破”。^[10]程少尉见无可理喻,先行离开,而荆游戎无法脱身,直至深夜才回到县城,将情形报告给县令。

知县邵鼎“拟以不了了之”,期望息事宁人。然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使得以桂阿荣为首的闹事者“声势异常汹涌”,将政府的不作为看作是对他们的畏惧,桂阿荣更是以扫帚星自居,日夜聚于镇上的茶馆酒坊,散播谣言。有关调查户口的谣言很快传到其他乡镇,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谣言的内容发生了改变,并将反对的矛头对向学堂,认为调查户口的事情是从学堂中发起,“唐家行学堂,已由乡民逼令停歇,而镇界刘河二镇竟有毁学情事”。一时间“谣言蠹起,东北各乡均岌岌不可终日之”。^[10]几天后(5月28日),陆渡桥乡又发生董少山家被打毁的事情。

随着事态不断发展,“该乡之稍有家财者靡不心寒胆裂,非特恐自治之不克进行,且忧日后地痞横行,难保身家。”^{[11]3}知县邵鼎也一改初期“拟以不了了之”的态度。6月2日夜,邵鼎调集划营数艘,派程少尉前往秘密捉拿宙十图为首的滋事者,不过,由于地保王应林暗中报信,仅仅捉获傅阿大一人,其余人全都闻风逃跑。此次逮捕后,在各地的茶馆中,仍有人扬言“如再复打,不妨由我为领袖,先至某家毁打云云”。甚至有人言“桂阿荣何必畏死逃命,一唱百和,勇往直前,何惧之有”。显然,

① 行龙:《清末户口调查及反调查“风潮”》,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6期;殷俊玲:《宣统元年反抗户口调查风潮》,《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樊翠花,池子华:《清末反户口调查风潮与政府合法性危机——以江苏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学研究》2009年第5期;邱羽:《清末户口调查述论(1906—1911)》,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

② 《嚆报》1908年10月创刊,1920年停办。《嚆报》在嘉定博物馆藏有第9号—第237号,嘉定档案馆藏有第36号—200号。综合起来现存215期。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有匡珊吉、王亚利对《嚆报》的概略介绍。佐藤仁史对20世纪地方政治言论进行分析时,对《嚆报》的史料价值进行介绍。参见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0—276页。

此次的逮捕并没有达到安定地方的作用,“邵大令究以何法善其后耳”也成为时人关注的重点。^{[12]2}

6月23日,知县邵鼎飭差严拿该乡为首闹事各犯。6月28日,县差持票下乡汇同地保一起捉拿闹事犯人,但地保陆鹤芳却“因向业私卖鸦片,屡被侯董查见禀办,故佯为同原差至各家拿捉,暗中知风报信,以致各犯逃脱法网”。^{[13]2}不过,闹事的十人中的两人稍知法纪,为避免牢狱之灾,首先发起自愿认罪赔偿,免于刑罚。先后有七人认罪,共缴纳四百二十元的赔偿金作为房屋修理费,并立下保证书,各自安分守己,如有再犯自愿加等受惩。闹事的首要桂阿荣、李阿二、毕阿小三人仍然在逃。早先拿押的傅阿大经过堂审,供词狡赖,在责罚竹梢若干后,仍命还押。

7月19日,为首者桂阿荣之弟桂金生被捕,桂金生作为闹事参与者,知县邵鼎并未重惩,而是暂时羁押,勒令交出其兄抢去的户口册。随后,在桂金生的协助下,官差及地保在常熟石牌镇将桂阿荣捉拿归案,判责臀四百,掌嘴三百,又责竹枝千下。面对知县的讯问,桂阿荣在供词方面一味的狡赖,并推称傅阿大为首,及问傅阿大,又彼此推诿,于是将二人收押醒悟堂,再行核断。自此,此案算是告一段落了。

不过,就赔偿金的问题,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赔款金缴纳至县里后,一直没有发给受害的乡董,对于款项的使用,时人传言“此项赔款中须提出二成作为衙门内开销”,“此虽系陋规,然数百年来之习惯,一时未易革除”。^{[14]2}而知县邵鼎一向以廉洁自励而闻名,此举使得民众大为失望。不过后经证实二八扣之说是误传,赔偿金除提出一百二十元充当习艺所经费外,其余三百元发放给各受害的乡董。

(三)风潮中的谣言蔓延

就同时期全国各地所发生的反调查户口风潮来看,风潮的产生大多伴随有谣言的传播。各地谣言在传播的内容方面大致雷同。江西丰城县调查户口,“有谓此次编查户籍,为异日征兵起见者,有谓将兴人口税者,其最下劣者,则误征兵为蒸兵,谓将来不免受釜甑之苦者,又谓兴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使得安稳者”。^{[15]10}湖北汉口蔡甸镇,有乡民谣传此次的,户口调查“系为抽丁当兵按口派捐起见,竟耸愚无知愚民数百名,蜂拥至该处各绅耆及调查员等住宅,哄闹不休,百般开导,执迷不信,并敢将某绅房屋拆毁”。^{[16]10}云南昭通地区,调查户口编订门牌时,“谣传谓国家现拟抽收人税、树

税、生男女税,故先行查明人户数目以便举行。”^{[17]11}

在各地有关调查户口的谣言中,既有传抽丁当兵,也有说按户抽税,还有镇压铁路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镇压铁路的谣言,嘉定陆渡桥风潮的起因就是来源于此。那这一谣言是如何传播嘉定地区?《民国嘉定县志》中记载:“唯其时适有调查户口之风潮,由常而苏而太,蔓延及于吾邑之陆渡桥乡。”^{[9]2896}大致能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谣言传播的线路。

江苏地区,反户口调查风潮首先发生在宜兴^[18],随后“江苏省各州县因调查户口,讹言迭兴,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8]通过当时《申报》中有关反对调查户口风潮的报道,可以观察到谣言在整个江苏地区传播的概貌。常州地区调查户口时,“忽有该乡四图乡民惑于谣言,谓系调查人民年庚,垫入铁路,纷纷向调查员索回原簿。该所所长包念兹君闻风驰往婉劝,当即解散。诂该乡六图亦为谣言所惑,适有妇女多人,路遇调查员,遂将衣襟扭住,纷纷向索原簿。”^{[19]11}苏州地区在调查将要结束的时候,“本地乡民忽四散谣言,谓调查各户人口,系因造铁路,需用数万人八字压入之故。迨后又有一女巫造言惑众,云某老爷上身告述,某日有阴兵过境,是以本地调查各户人名八字将来入册,各人均去当阴兵云云。各乡民闻之大为惊惶,咸思将调查户口底册追回。”^{[20]11}苏州震泽镇民众相传,“造人民册非为铁路打桩等项之用,何以某处人民入册后已死去不少?或云造人民册连地送与外人。”^{[21]11}镇江金坛在户口调查时,“此次调查姓名以为填造洋桥之用。”^[17]恰逢当时洋人在金坛买药,民众信以为真。

谣言是如何一步一步由常州传到苏州,以至于到嘉定?田海有关16世纪以降谣言传播路径的研究,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他认为“谣言是沿着我们今天所知的商业通道及漕粮的运输网络扩散的。相较于其他地区,商业化程度极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容易为林林总总的谣言所袭击”。^{[22]290}

近代以来,江浙沪地区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成为铁路最先动议和建造的地方,先后修建了吴淞铁路、津镇铁路、津浦铁路、沪宁铁路等铁路。其中,沪宁铁路于1905年开始修建,1908年通车。^{[23]114}整个沪宁铁路分为七个大站,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嘉定段作为沪宁铁路重要的一部分,“东自毗连宝山境之陈店乡芥十八图界河起,迤西北经南翔、封浜、真圣堂三项,再

入封浜乡越青浦界,复由黄渡乡经方泰乡再入黄渡乡,再入方泰乡至安亭乡小徐公浦止。”^{[9]2729}铁路的修建在加速各地间交通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的信息传递。有关镇压铁路谣言产生的几个城市,常州、苏州、镇江以及嘉定,都是沪宁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一方面这些地方因为修建铁路的经历,铁路开始进入民众的视野中,使得谣言有了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铁路的修建又加速扩大了谣言传播速度和范围。

如何看待这些谣言在各地的传播以及风潮的产生?《嚆报》在反调查户口风潮发生后曾刊登过这样一段评论:“调查风潮之成,成于谣言,而谣言之所以动听者,以生命财产之说,故夫生命财产之危,虽大智者犹将设法以保护之也,而况于愚者。”^{[24]1}无论是谣传的抽丁当兵,按户抽税,镇压铁路,这些都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自然对此格外的关注。“一般来说,除了造谣者具有明确的目的外,其他人在被动地转述和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很少会对谣言的来源和真实性加以理性的分析。”^{[25]285}全国范围内谣言的传播,因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激起了群内成员的情绪反应,从而很容易出现类似风潮。

二、风潮爆发的因素分析

不可否认,谣言与风潮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谣言本身是一种社会心理环境的产物,当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或遇到突发事件谣言便应运而生。^{[26]21}清末十年,正处于封建王朝即将倾覆的大变动时代,绅民对立、官员懒政、民智未开既是谣言产生的原因,也是风潮发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 绅民对立

1900年标志着一个世纪的自然转折,也是一个富含社会文化内涵的历史转折。^[27]在随后的十年间,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转折与变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后义和团时期的中国表现出了强烈的乡村抗议,社会底层的民变时常发生。有学者统计,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到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辛亥革命前期,全国共发生民变1028期。^[28]从民变发生的年份上来看,主要集中在1906年(133起)、1907年(139起)、1909年(116起)、1910年(217起)和1911年(108起)。由此可见,民变的发生更多的集中在1906—1907,1909—1910年,而且在1910年成为爆发的最高点。

清末地方秩序的动荡与失控使得民变不断产

生,多数的民变以绅民冲突的形式出现。此次嘉定陆渡桥风潮中,“被殴者为所长侯史封,身伤沉重”,“经董杨福昌、金晋文、顾振言、梁庆堂、梁心田、费为南、秦廷爵七家,门窗、凳枱、水车、屋面以及杂物尽被打毁。”^{[29]2}在民变的风潮中,士绅阶层很容易成为矛头指向的对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该时期绅民关系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系。

“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30]856}传统社会中的官绅民关系,士绅处于官民之间,成为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随着新政的实施,绅民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与旧政不同的是,新政以及由此推进的地方自治制度,为日趋扩展的士绅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基础,并将传统时代基于习惯或地方情景的非制度性绅权也加以合法化和制度化。”^[27]士绅利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获得乡村公共资源,新政改革使士绅在政治和经济确立了更大的优势。周锡瑞就指出:“地方自治会和较早的地方绅权设置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延续。”^{[31]111}

在光绪三十四年颁布的《调查户口章程》中规定:“调查户口事务,归下级地方自治董事会或乡长办理,以总董或乡长为调查长,董事或乡董为调查员。其自治会尚未成立地方,由各该监督率所属巡警,并遴派本地方公正绅董,会同办理。”^{[32]102}新政的实施,使得这些董事或乡董成为调查户口的主要执行者,正是如此,他们成为风潮发生后最先受到攻击的对象,究其原因,与他们推行新政的方式和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时人有过这样的评论:

“今夫乡间之负声望、饶财产而周旋于官绅间者,视其乡之农人,每以其愚蠢不晓事而不屑与语时事,孰知今日之时势,凡乡间之不识字不能阅报之人,全赖有智识者之百端讲论,为能启其愚耳。若自以为智,厌人之愚,而屏弗与语,彼愚无知者又安得而有知哉。”^{[33]3}

在陆渡桥乡风潮发生不久,“因乡民误会,均疑调查户口等事为学堂中所发起,闻唐家行学堂已由乡民逼令停歇,而镇界刘河二镇,竟有毁学情事。”^[10]户口调查与兴建学堂,都是清末新政的重要部分,由此而引发的民变,则反映出民众对于新政的不满。兴建学堂是清政府培养人才,振兴国家的重要举措。不过,在修建学堂所需费用方面,主要取自于民众,“学堂之兴,当戊戌岁,自是以降,学堂之数日增,而各项新政之需款者,亦与年俱进。”^{[34]1}对于民众来讲,因兴学所捐纳的赋税,与平时的捐纳并无区别,在学堂兴办的过程中,民众也没有获

得实际的益处。“捐于学堂,与捐于官吏,均为剥肤之痛,捐于官吏,于吾民为无益,则捐于学堂,于吾民亦为无益。”^{[35]78}这使得民众“举凡一切因筹款而受之苦,悉业其怨于学堂”。^[34]

清末废科断绝了士绅阶层仕进之途,因此,许多士绅通过兴学而参与地方事务,被时人称为“学界中人”。事实上,清末新政千头万绪,几乎各项事务都是仰赖“学界中人”具体实施,以致人们认为,“一切新政之举,殆无一不属于学堂中人者。”^[34]不过,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地方士绅对乡民常常表现得过于傲慢,“以其愚蠢不晓事而不屑与语时事”,或者“务为不入耳之言”。时人对此指出,“近来办事之人,大抵有一种矜贵之气,令人不可向迩,而学界中人尤甚。”^[34]兴学捐税使得民众积怨已久,加之户口调查中办事者素质不高,缺乏合理的方式,对待民众多采取鄙夷的态度,自然引起民众的不满。“如是者,交集矢于学界中人”,导致“毁学”之事的发生。

(二)官员懒政

《东方杂志》在记述江西调查户口风潮时,将风潮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地方官员“其祸因地方官因应失宜”。^{[36]321-322}对于清政府来讲,在调查户口之前,没能将此次调查的目的和方法向民众宣讲清楚,民众对于何为“新政”一无所知,为谣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各地方之筹备自治所,类有宣讲员赴各乡宣讲,当调查户口之先,调查之用意若何,调查之方法若何,不当宣讲透澈诏告乡民,使有以识调查之故,而不至于骇诧乎?使果一一解释,宣讲透澈,则乡民于调查户口一事,耳熟能详疑虑尽释,亦何至于谣言蠹起。”^[33]而且,官员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行为方式,也值得商榷。“为官者急宜巡行乡野,竭诚演说,间招耆老,接以温言,尽情劝谕。乡民虽愚,听官之絮语,而亲见其愉色,必且转怒为喜,而释然解其暴动之心。而为调查员者,又从而设法劝遵,曲述理由。如是而民犹胶执成见肆为暴动者,吾不信也。”^{[37]3}显然,在这一时期,民众与官员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官府的公信力和权威逐渐下降,“官民之间平时隔绝已久,今未施信于民,而强使民信,遂以致种种之烦扰耶。”^[6]

新政实施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经费,就清政府自身的财力讲,既要兑现赔款、借款,又要维持传统的财政支出,显然无力应对,只能采取向地方摊派,由县级政府解决经费问题。《调查户口章程》中规定,户口调查所需要的经费由各地方自筹。新政改革的经济反响体现的是农村纳税者不断增长的沉重

负担。^{[38]39}据学者统计,1907年以前,既是临时性的附加税,一年的数额也不会超过200万钱,1907年已经增加到580万钱,到1908年超过了1400万钱,1909年到1910年间将近达到1600万钱,其中自治筹款占很大比重。^{[39]156}时人评论道:“戊戌以还,新政全兴,库藏益匮,十余年来,盐斤加价也,房捐也,酒捐也,钱粮带征赔款也,是为取诸民以培国者。”^[24]频繁的征税,各种名目的新捐不断产生,户口调查很容易使民众将其与纳税相联系。嘉定西门乡议长黄守恒在向县自治筹备公所上呈的议案中,也对风潮发生的原因进行过分析。“选民资格之最难调查者,莫如纳税数一项,则动足启人疑惧之机,因是而酿为风潮者有之。如陆渡桥等处以年岁为藉口,此乃特别情形,且其祸源之发,实亦以调查纳税数之故。”^{[40]1}

嘉定陆渡桥乡发生抢砸乡董房屋的事件后,地方官员的态度也值得注意。风潮发生后,知县邵鼎“拟以不了了之”,只派遣官员下乡查看情况,并没有对祸首采取任何措施。随后因事态扩大,谣言四起,才开始调集飞划营数艘,下乡捉拿闹事者。从风潮发生,到祸首到案,期间经历两个多月。《嚬报》有评论称:“所望邵大令雷厉风行,严拿惩办,自治前途系匪浅。”^[13]地方官员在风潮发生后,对于事件处理迟缓,没能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使得风潮的影响扩大,进而出现打砸学堂等事件。新政执行过程中风潮的产生,与官员自身能力不足有着重要的关系。时人曾评论道:“今应旧习惯之官吏,强其执行新政,学非所具,即有欲竭力办事者,亦苦无正当办法,故新法虽颁,上行而下不能效。”^{[41]47}因此,官员自身素质成为新政能否顺利执行的重要因素。在陆渡桥乡风潮发生不久,便传来知县邵鼎被撤职的消息,其原因是因为在办理新政的过程中,对于需要所上报的各种司法统计、各表及清讼月报,一概未办,经多次催促,才开始将前项各表册逐月补造呈送。^{[42]11}

三、地方社会的应对及效果

在反对户口调查的风潮发生后,各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在嘉定,除了及时逮捕罪犯、缴纳赔偿金外,开始发布告示,向民众进行宣传解释。

(一)加强沟通,消除疑虑

6月2日,风潮发生不久,《嚬报》刊登《敬告误信谣言者》,对地方自治和户口调查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办地方自治,使我民不至受暴虐之官治,此我民莫大之幸福也。自治职员,须从选民中举

出,欲得选民,需先调查户口。故选民者,我民至荣之名,调查户口者,自治最先之事也。今我民乃反对之,岂非将好意为恶意乎?至于造桥打市椿之说,皆系匪徒煽惑之言,我民只须静心一思之,全中国无处不调查,若曰用册以杀我民,岂非全中国之民皆陷于死地乎?邑已调查者已不少,何以此各地之民,又皆安然无恙乎?我民若一思及此,必当恍然大悟矣。”^{[43]3}不过,就《嚶报》的读者受众来看,主要是支持立宪制与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新式学校的教师、学生以及工商业者、实业家。^{[44]250}报纸受众范围小,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很难接触,而且这也只是报人群体进行的宣传工作。

《嚶报》发布告示后,官府也发布了“六言韵示”,对于调查户口和学堂一事进行解释,“调查户口一事,只问年岁职业,毋须时辰八字,问答最为简捷。乃有不法之徒,任意造谣混说,以为送给外人,性命恐将绝灭。”“至于大小学堂,皆系朝廷特设,一切开支经费,尔等并未捐贴。堂内教习学生,无非朋友亲戚,平日彼此相安,并无丝毫嫌隙,岂可无端仇视,到处造言恐吓。”^{[45]2}希望民众不要轻举妄动,如果发生闹事不会宽容,而且会从严处理。

此后《嚶报》又刊出《县发白话告示》和《调查户口之缘因》。《县发白话告示》以打油诗的形式,用白话文向民众介绍了户口调查与地方自治、选区划定、选举议员之间的关系,以便消除他们的误解。“告我民为什么要查户口,今皇上爱百姓都像家人。大清国廿二省譬如一家,一家内通共有子女几人。为父母当了家应该知道,这就是查户口实在原因。也不是要抽丁问你人数,也不是要派捐费你钱文。也不是要造桥用你八字,倘有人造谣言哄骗你们。你们是好百姓,切莫上当,上了当闹了事,反害自身。有人来问你们姓名年纪,你尽管一件件回答分明,就是那大乡绅也是一样,这告示劝你们个个放心。”^{[46]2}

《调查户口之缘因》由自治筹办处发布,同样用白话的方式,向民众解释有关调查户口的问题,基本内容与所发的告示相似。“调查户口,是官府奉旨宪办的,就是从前的保甲门牌,差不多办法,你想想大清国的地方,共有多少大?皇上家管了这大大的地方,同百姓人家,管自己一家的事情是一样的。你们一家的妻儿老小,共有几个人,是自己知道的。倘若皇上家管了大大的地方,这地方上有多少人全不知道,岂不是笑话么?”“那晓得有一般人大惊小怪,造起谣言来了,有的说是要派捐了,有的说是要抽丁了,有一种最荒唐的话,说道要拿姓名

八字去打铁路的桥桩,等那铁桥造好了,这性命就不保了。这都是胡言乱语切莫要去听他。”^{[47]2}相比于最初发布的“六言韵示”,白话文的使用,使得民众能够更容易接受。

各地风潮的发生,也引起了清廷的重视,专门颁布《预防新政扰民之办法》,认为“各省民间时有聚众抗官之举,皆由地方官不善办理”,特别通电各省都督,“凡地方举办各种新政及关于筹款之事件,应先由自治局或官立之宣讲所,并派公正绅董将办理,新政之理由先行发明,以免误会,若关于筹款之事,尤须将筹款之办法,需款之数目,用为何项经费,并于人民有何利益,详细布告俟,多数绅民认可无甚异议,然后实行举办,更不得假手吏役,需索扰累。”^{[48]4}如果再次发生类似风潮,“该管官万难辞其重咎”。

显然,清政府在此次风潮发生后,意识到宣传工作与新政实施之间的重要性。此外,还颁布了《筹备处札发厅州县流通宣讲章程》,根据章程规定,在各地筹备自治公所设置宣讲员,定期去各乡镇人口众多的地方流动宣讲,每地宣讲十日,每日两小时。其内容除了调查户口的缘起,不要听信谣言外,也对地方自治的有关事宜进行宣讲,并向识字者发放白话讲义。

(二)调查仍陷困境

从清政府宣讲的效果来看,只能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嘉定地区此后并无大的祸端产生。但仍有部分民众对调查户口一事进行反对。11月22日《嚶报》报道,“唐家行调查户口已经竣事,造册送县,诟有服三十九图某姓老姬数人,听信某女巫之谣言,日向本图经董家百般吵闹,声言非将户口册取出烧毁,吾辈非死不休,后经各经董挽人多方劝解,幸不酿祸”。“樊家桥调查户口业已毕事,调查时有某姓等五六家抗拒调查,为姚大令所闻,提某甲到案,管押数日,俟调查毕事,即行讯释。”^{[49]2}

相比于民众的反对,各乡董在执行过程中的懈怠、敷衍成为风潮后户口调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嘉定曹王庙的厂董,“现因筹办自治已购备调查表册,惟并不推举调查员,即将调查表册交于地保,查写并嘱其依照旧时门牌写法。”^{[50]2}各图的地保大都目不识丁,而将此事交予他们执行,其结果便是抄录旧时门牌敷衍塞责。

1908年颁布的《调查户口章程》专门对户口调查年限进行规定:“人口总数应自本年起于第二年十月前汇报一次,至第三年十月前一律报齐。”^[32]1910年已经到了规定中的“第三年”,各地需要在九

月初十之前将调查户口的数目上交。不过,临近规定期限,“各区交到清册,尚未及半数,日前省委到县催提清册,姚大令以无可为力,先催取各区户口总数,以便汇报,然查未竣事者,尚復不少。”^[51]即便后来在县自治筹备公所催促之下,各区基本完成,但城自治公所上报的清册,却是抄录去年的数据。^[52]

结 语

户口调查作为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在清政府的设想中,户口调查结果可以用于划定选区、调查选民、选举议员,进而成为实现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础,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风潮。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案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官绅民之间复杂关系的缩影。

第一,新政是清政府经历了“庚子之变”后所展开的全面自救,其直接压力来自于外部,而非基于国内社会的一致需求。因此,新政一开始,地方政府就缺乏与基层民众的良好沟通,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关系。新政没有给民众带来直接的利益,反而因为筹措经费而抽税纳捐,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使得民众一听到户口调查便与纳税相联系,户口调查也成为民变产生的导火索。

第二,新政也改变了士绅作为“官民中介”之传统形象,民众与士绅趋于对立。科举废除后,士绅力图借助于新政而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但面对民众却是沿袭了传统时代一贯居高临下的傲慢,视大众为愚民,从而招致民众怨恨,成为民变最先攻击的对象。

调查过程中所发生的反对风潮,一方面影响了户口调查的进度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反户口调查风潮与各地的抗捐税斗争、毁学风潮、反禁烟风潮共同构成巨大的社会冲击,加剧了清政府统治危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户口调查也被迫中止。

[参 考 文 献]

- [1] 巡警部奏清查户籍折[J]. 东方杂志,1906,3(8).
- [2] 清查户口问题[J]. 东方杂志,1907,4(4).
- [3] 民政部奏清查户口以举民政折[J]. 东方杂志,1907,4(7).
- [4] 邱羽. 清末户口调查述论(1906—1911)[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36—337.
- [5] 张振鹤. 丁原英编:清末民变年表[N]. 近代史资料,1982(4).
- [6] 记江西调查户口之风潮[J]. 东方杂志,1909,6(8).
- [7] 行龙. 清末户口调查及反调查“风潮”[J]. 清史研究通讯,1988(6).
- [8] 江苏乡民滋事余闻[J]. 东方杂志,1910,7(5).
- [9] 陈传德等修.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0] 陆渡桥乡调查风潮纪实[N]. 嚆报,1910—6—2.
- [11] 陆渡桥闹事首要拿获解案[N]. 嚆报,1910—7—31.
- [12] 廖总董决意辞职[N]. 嚆报,1910—6—16.
- [13] 陆渡桥闹事各犯认赔了事[N]. 嚆报,1910—7—1.
- [14] 二八扣又来了[N]. 嚆报,1910—7—16.
- [15] 丰城调查户口大风潮详记[N]. 申报,1909—6—22.
- [16] 蔡甸调查户口之风潮[N]. 申报,1910—1—10.
- [17] 昭通亦有调查户口风潮[N]. 申报,1910—4—29.
- [18] 樊翠花. 晚清政府应对民变举措初探——以江苏为例[J]. 南方论刊,2009(12).
- [19] 阳湖调查户口之风潮[N]. 申报,1910—4—19.
- [20] 香山自治公所被毁详情[N]. 申报,1910—4—16.
- [21] 江震乡民反对调查户口详情[N]. 申报,1910—4—29.
- [22] 田海.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M]. 上海:中西书局,2017.
- [23] 李占才主编. 中国铁路史(1876—1949)[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
- [24] 调查户口风潮之感[N]. 嚆报,1910—6—16.
- [25] 徐茂明.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6] 苏萍. 谣言与近代教案[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27] 王先明.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J]. 近代史研究,2008(1).
- [28] 杜涛. 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J]. 福建论坛,2004(6).
- [29] 陆渡桥乡调查风潮纪实[N]. 嚆报,1910—6—2(2).
- [30]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856.
- [31] 周锡瑞.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 杨慎之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2:111.
- [32] 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 清朝末期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102.
- [33] 闻宜兴乡民肇事感言[N]. 申报,1910—3—17(3).
- [34] 调查户口风潮之感[N]. 嚆报,1910—6—16(2).
- [35] 毁学果成为风气耶[J]. 东方杂志,1904,1(11).
- [36] 三记江西调查户口之风潮[J]. 东方杂志,1909,6(10).
- [37] 论调查户口[N]. 申报,1901—3—20(3).
- [38] 蒲乐安.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M]. 刘平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9.
- [39] 王业键. 清代田赋刍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6.
- [40] 县自治筹备公所参议会第一次议案[N]. 嚆报,1910—9—13(1).
- [4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

-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47.
- [42] 嘉定令不谙新政撤任[N].申报,1910-7-28(11).
- [43] 敬告误信谣言者[N].嚶报,1910-6-2(3).
- [44] 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250.
- [45] 县发六言韵示[N].嚶报,1910-6-16(2).
- [46] 县发白话告示[N].嚶报,1910-8-29(2).
- [47] 调查户口之缘因[N].嚶报,1910-10-12(2).
- [48] 预防新政扰民之办法[N].申报 1909-10-2(4).
- [49] 调查户口之困难[N].嚶报,1910-10-12(2).
- [50] 筹备自治之轻忽[N].嚶报,1910-8-14(2).
- [51] 办理清查户口之困难[N].嚶报 1910-10-12(2).
- [52] 太善于塞责矣[N].嚶报 1910-10-12(2).

(责任编辑:闫卫平)

Political change and Local order

——A Study on Counter census of Jiad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QI Chao-ru, XU Mao-mi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urvey conducted in Xuan Tong Period not only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llect taxes, conscription and labor, but also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local autonom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ts implementation in various area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urvey triggered large-scale opposition and even led to civil insurrection. One of Jiading's local newspapers, the Liu newspaper detailed the agitation against the census. This trend can be attributed not only to the rumors, but also to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New Deal was the comprehensive self-rescue movement launch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fter the change of Gengzi, and its pressure came from the outside, rather than the demand of a domestic society. Instead of bringing direct benefits to the socie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new policies has made people be the main targets of tax collection and donation, which increases their burden.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al also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gentlemen and people. Gentry control more over the rural economic resources, have greater advantages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which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tlemen and people tense. What happened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against the trend inhibited the progress of the census and the accuracy of statistics. The agitation of the rebellion caused by the trend exacerbated the governance crisis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ading; Census; Liu newspaper